

# 墨子、墨学与墨子里籍论争

杨晓宇

## 一、关于墨子

墨子，姓墨名翟，是夏代大禹之师墨如的后代，生于春秋战国之交，“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荀卿列传》），其生卒年考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根据史书记载和古迹、口碑佐证，墨子生地当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二郎庙乡（按：今为尧山镇）竹园村。老年隐居于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死后亦葬于此地。

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无论在近代社会科学或是自然科学诸学科里边，都能找到墨子思想的痕迹。因而，他被中外学术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科学之圣”。其著作《墨经》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可以说墨子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墨子的学说上承夏制，异于儒学，且其尚同、兼爱、节用、非攻、非儒、非乐等系统思想符合中下层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所以极受人民群众的欢迎，被称为“平民圣人”，成为战国与秦汉之际的惟一可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一代显学，《韩非子·显学》篇即谓：“世之显学，儒墨也。”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说，能突起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儒家学说分庭抗礼，其一说明它弟子众多，力量强大，学说深入人心，受到多数人的欢迎；其二说明其能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墨子也曾携弟子游历楚、鲁、宋、齐等国，比儒家更受欢迎，其原因主要在于能接近社会现实，经得起社会实践的考验，他的止楚攻宋和帮助鲁阳文君治理国家及对军械的研究、制作与应用等，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也决定了他不可能遇到如孔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的结局。作为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墨家产生于儒学势力薄弱的鲁阳，是有一定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基础条件的，墨子里籍在鲁阳的论断，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与文化发展规律的。

## 二、关于《墨子》

《墨子》一书，为墨家经典学说。该书部分为墨翟所著，部分为墨家弟子写入，是后来编进去的。《汉书·艺文志》记录《墨子》全书共七十一篇，高诱为《吕氏春秋·当染》篇作注时为七十一篇，但为同书《慎大》篇中注为七十篇，说明在汉之前，《墨子》一书尚存七十或七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五卷·目一卷”，与梁代典籍《子钞》、唐代《意林》等所述十六卷之数当为一致。《唐书》之后史书均记十五卷，可能其“目一卷”已佚。近代出版的《墨子》一书，实存《亲土》《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尚同上》《尚同中》《尚同下》《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非攻上》《非攻中》《非攻下》《节用上》《节用中》《节葬下》《天志上》《天志中》《天志下》《阴鬼下》《非乐上》《非命上》《非命中》《非命下》《非儒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共五十三篇，另有《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乐中》《非乐下》《非儒上》《非儒中》九篇存目。

《墨子》内容丰富，有记、有辩、有说、有论。涉及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道德、逻辑、数学、物理、技艺、治兵、军械、战术、用人、经世等，特别

是尚贤、尚同、兼爱、节用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军事思想和军械制作技术，亦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物理学上的“小孔成像”理论、光学理论和几何理论等，都比国外相同理论的产生早得多，只是到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地位一跃而成为历代之典，与其相对立的墨家则从此一蹶不振。墨家经典之学《墨子》残存于其后传弟子之中，没有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即便如此，难以遮掩的伟大思想仍不时闪射出夺目的光辉。到了清代之后，随着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墨子》这一先秦显学重新受到思想界的重视，出现了毕沅、武亿、孙诒让、胡适、郭沫若、张纯一、方授楚、范文澜、冯友兰、任继愈等一大批研究墨子的学者，并逐步由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向综合思想研究、里籍生平研究等多方面、深层次开拓，终于使墨学思想重新在中华大地上大放光彩。

### 三、关于墨学传承与组织活动

《韩非子·显学》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墨。”这说明，墨子弟子在墨子去世后，其内部产生较大分歧，分成三个较大的派别，各派都有明显的特点：“裘褐为衣，跣跣为服，日夜不休，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诵《墨经》而背诃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此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陶潜集·集圣览群辅录》）。其实，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墨翟弟子三个派系中的这主要两派，一是专在研究墨子的技艺之学而实践之，重在应用；而另一派专于研究墨子的思辨之道，重在思想理论。但又因以上三派被后人统称为“别墨”，应该说，墨翟的主要传人及派系应是禽滑厘一脉。禽滑厘原为儒家弟子，因不满意于儒家之学，改投在墨家门下，是墨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墨家后传许犯、田俅，又与其有明显的师承关系。那么，为什么在《韩非子》中所述墨离为三而无禽滑厘呢？根据徐州师院罗其湘先生的研究，墨家后来演变为隐灵教，主持教庭的人称“钜子”，高级弟子称“灵子”，一般弟子称“学子”。灵子又分为内传和外放两大类，内传弟子不涉外事，外放弟子不问内务，主要是为了隐教安全。禽滑厘为墨子之后第一个钜子。隐庭原无定所，随钜子之行踪而迁移。如按罗先生的这一观点，以上墨家传承中的一些难解之迷就可以找到答案。鲁山县发现的黑隐寺与墨子洞，有可能就是墨翟老年或其弟子创立隐灵教的原始教庭。禽滑厘为墨家祖师墨翟之后的第一位钜子，而相里、相夫、邓陵子三家别墨，是三个外放灵子。这些问题较为复杂，在此暂存一说，留待今后史学界进一步研究考证。

### 四、关于墨子里籍诸说

由于汉代之后墨家影响渐微，因而司马迁著《史记》时，并未把墨子及其学说放在“显学”位置，而只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以“盖墨翟，宋之大夫，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也有学者认为在此句前还有文字，只因脱简已无从考。于是，在墨子里籍问题上，留下了千古悬案，历代史家相持不下，主要的就有四种说法：其一，为“外国人说”。1929年胡怀琛的《墨子为印度人辩》一文肇其始，他认为墨子面黑而称墨，应是印度人。其摩顶放踵，苦而为义，节用尚俭乃是佛教徒所为。卫聚贤撰文认为墨子是阿拉伯国人，他们共同认定的证据是墨子色黑，鼻高，不是中国人的面像。金祖同、陈盛良等也认为墨子是阿拉伯到中国定居的回人，根据是《墨子》一书句法难懂，有回民族的句法。此“外国人说”一出，即受到史学界批驳。其二，是“宋国人说”。根据即《史记》中说墨子当过宋国大夫，《墨子》书中也有助宋拒楚的记述。但人所共知，春秋战国时代异国为官是正常的，甚至有一人为数国之官者。有为

之士帮助别国治国打仗也是正常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把此作为确定墨子里籍的根据是说服不了人的。再者，《墨子》一书虽记载有墨翟在宋国的活动，但经调查，古宋国商丘一带并无墨子遗迹，也找不到任何记载墨子仕宋的资料，因而也是没有根据的，此说现已被史学界否定。其三是“鲁国说”。持“鲁国说”者，认定此“鲁人”即“鲁国人”，此“鲁国人”即曲阜鲁国人。此说以清末孙诒让为代表，是针对高诱、毕沅、武亿的“鲁阳说”提出来的。其后，有关墨子里籍的争论在“鲁国说”与“鲁阳说”之间久争不下。到了现代，随着争论问题的逐步清晰化，“鲁国说”因论据益穷而放弃论争，山东曲阜市亦不再参与。其四，是“鲁阳说”。墨子为鲁阳人，最开始是汉代高诱注《吕氏春秋》时，经考证认为墨子为鲁人。《路史·国名记》认为，此鲁人之鲁，为“汝之鲁山县”。到了清代，大学者毕沅据此在其《墨子注序》中认为墨子“姓墨名翟，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武亿编纂嘉庆《鲁山县志》时，又把墨子里籍在鲁阳写入志书，并说明“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鲁四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因“鲁阳说”记载最早，论据充分，又出自历代大家之口，因而得到了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肯定。

### 五、关于“滕州说”突起及其论争概况

根据以上介绍，墨子里籍鲁阳说经汉高诱、清毕沅、武亿等考证，已成定论。但由于清末学者孙诒让在《墨子传略》中仍存“鲁人”、“宋人”两说，且明言此“鲁人”为“鲁国人”。并在《案语》中对毕、武之说进行反诘，成为“鲁国说”百年争鸣之源头。到了近年，由于名人效应和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鲁国旧都所在地之曲阜先开始把墨子列为本市历史名人进行研究，但由于史料遗迹等诸方面证据均欠缺而只好罢手。后一些山东学者又想把墨子里籍搬到菏泽市，并着手筹备墨子里籍研讨会，因史学界无人响应而终无结果。墨子里籍问题在山东呈现冷场局面。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对于学术研究，特别是有争议的历史悬案，只能依据事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严密考证，使其逐渐向历史事实靠拢，而不能以个人感情去任意枉说，更不可因一方利益而杜撰论据。历史上不乏严谨治学之士，正是他们破解了一桩桩历史悬案，如持鲁阳说的清代经学家、考据学家毕沅，就曾任河南、山东两地巡抚；把墨子里籍明确载入《鲁山县志》的武亿，是著名方志学家，也曾任山东博山县知县，他们都对山东、河南较为熟悉，又都是治史大家，既有实地考察之条件，又有史学研究之经验，为什么都把墨子里籍认定在河南鲁山而不是山东某地呢？道理自然只有一个，就是要对自己的立论负责，绝不囿于地域之见，而是肯定要下一番功夫考证的。当代学者，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任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的刘蔚华先生，在经过严肃认真考证研究之后，亦在1982年第四期《中州学刊》上发表了力作《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一文，理清了为什么墨子为“鲁人”是指河南鲁山人，以及河南鲁山之古鲁国与曲阜古鲁国的上下相承关系，为“鲁阳说”找到了新的依据。可以说，这些古代与现代学者的秉公治史精神和严谨治学态度是可钦可敬的。但遗憾的是，刘蔚华先生的结论性论述却惹怒了山东另外一些学者，他们被牢牢束囿于地域、门户之见，陷入已被史学界放弃的“鲁国说”内而不能自拔，且想当然地把“鲁国说”视为“山东说”，先曲阜，后菏泽，再滕州，总之，非要在山东境域内给墨子安上“户口”不可。以滕州籍的山东学者张知寒先生等为首，在《枣庄日报》、《山东社会科学》杂志上针对刘蔚华先生的文章，先后发表了《墨子原为滕州人》《墨子里籍新探》两文，把“鲁国说”变为“滕州说”，开了墨子里籍“滕州说”之端。枣庄市借机抓住墨子故里“滕

州说”，从1991年6月起，不惜花费巨款，在滕州连续召开全国、国际墨子学术讨论会，建造墨子“遗迹”，立起墨子铜像，成立墨子研究中心、墨子研究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原本鲜为人知的滕州借此名扬海内外。当然，在这一文化舞台上，也唱了一出经济好戏，向世界打开引资、贸易开放之门，获得了数亿元的效益。

在山东学术界打响的新一回合的墨子里籍之争，理所当然受到“鲁阳说”墨子故里河南省、平顶山市和鲁山县知识界的关注，萧鲁阳、杨静绮、郭成智、潘民中、杨晓宇、陈金展、郑建沛、张新河、张九顺、张怀发等同志进行了大量考察调查，在山东《哲学社会科学动态》《中州学刊》《求索》《平顶山日报》《平顶山师专学报》《墨子在鲁山的史料与传说》等报刊和文集中，陆续发表了《墨翟故里考辩》《墨翟故里觅踪》《墨子里籍考辩》《“儒墨同源”与“法夏继周”考辩——兼论墨子里籍问题》《墨子中的鲁山地区方言》《墨子鲁山人十二证》《关于墨子遗迹与墨教传承的调查》等一大批正面论证文章，和《“墨子里籍滕州说”质疑》《墨子本来就是鲁阳人——与张振衡、徐治邦先生商榷》《臆断岂敢立论、附会何能为据——评张知寒先生“墨子里籍滕州说”》《对鲁国的再认识——兼与李永先、魏正峰等同志商榷》《墨子滕州人说讹谬——读张知寒、李永先论文有感》等数十篇论辩文章。平顶山市和鲁山县并保护性开发和对外界开放了一系列的墨子遗迹，国家、省、市、县四级墨子里籍研究会（或研究中心）也筹建起来，这一切都当然地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并受到大多数墨子研究专家的肯定。“滕州说”与“鲁阳说”关于墨子里籍之争被称为国内继南阳与襄阳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后的又一场跨省际历史名人之争大论战。

## 六、关于“鲁阳说”的论争优势

墨子里籍在鲁阳是历史的事实，因此，在豫鲁这场有关墨子里籍大论战中，“鲁阳说”当然存在着绝对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资料、方志、墨子研究典籍中有明确记载。主要有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宋代罗泌的《路史·国名记》、清代毕沅的《墨子注》、清代武亿的《跋墨子》、清嘉庆《鲁山县志·艺文志》、《鲁山县志·集传》、《鲁山县志·循政记》、新纂《鲁山县志》、《平顶山历史名人传》、《平顶山名胜古迹》、《墨子在鲁山的史料与传说》、新纂《平顶山市志》等资料。而且，在方志中记载墨子里籍，嘉庆《鲁山县志》是全国旧志中惟一的一本，山东曲阜、滕州历代修志均无有墨子的任何记载。

2. 《墨子》等书中有可靠的证据。其一，在《渚宫旧事》中，鲁阳文君对楚惠王说：“墨子北方贤圣人也。”《吕氏春秋》中墨子向楚惠王自称为“北方之鄙人也”。这里的北方，自然是楚国北方，正与鲁阳在楚国北方的位置相一致，墨子在《鲁问》篇中，两次谈到自己是“中国人”，当时“中国”的概念，只指夏商活动的中原地区，严格地说，山东时为“东夷”，楚国时为“南蛮”，都非“中国”之土，但鲁阳原是中原之地，为夏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现有尧的后代，夏的臣子刘累居鲁县的史料记载，今鲁山县著名国家级旅游风景区尧山，上有尧祠与累亭等名胜古迹，墨子之祖，大禹之师墨如亦尧之后裔。周灭商后，鲁阳始为周王室姬姓封国，继而属郑，只是后来才被楚国吞并，成为楚国北方重镇。作为鲁阳人，墨子自称“中国人”，即中原人，是完全说得通的。他在《鲁问》中向鲁阳文君谈“中国之俗”，正是向不甚了解中原习俗的楚王室贵族子宽进谏治理鲁阳之策。此“以中原之俗治中原之地”不失为墨子给鲁阳文君进献的定国之策。由以上例证也说明了墨子与鲁阳文君的君民（臣）的关系，进而可知墨子

是鲁阳人。其二，墨子著作中有大量的鲁山地区方言。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萧鲁阳、鲁山县史志办副编审郭成智先生考证，《墨子》一书中有许多鲁山一带方言，如“荡口”“隆火”“安生生”“强梁”“不材”“中不中”“饥”等近百处之多。而山东滕州则无此说法，只称“饥”为“饿”，称“隆火”为“点火、引火”；称“好不好”为“管不管”，更不说“中不中”。“中”字用法为明显的、极具特色的河南方言，甚至成为河南人口音的象征。语言，特别是一个地区的方言土语，可以说是研究该地区历史情况的活化石，《墨子》一书中大量河南方言、鲁山方言的应用，是墨子里籍在鲁阳的有力证据。

3.考古发现和古迹遗存。鲁山县有大量的墨子遗迹：经文物部门考古发掘和社会调查，有多处实物佐证，如：①上汤“墨子故里”石碑。立碑时间不知为何年，1934年因扩路被搬掉，1941年国民党汤恩伯部驻军鲁山，为修上汤花园和温泉浴池，把路旁历代石碑统作墙基，“墨子故里”碑从此埋入地下；②赵村乡中汤村“墨莲池”；③辛集乡龙鼻村“墨井”；④赵村乡、四棵树乡、熊背乡、辛集乡等处“墨子庙”。⑤大茅山“墨子聚徒学艺处”；⑥董周乡“墨子为鲁阳文君解围处”；⑦四棵树乡“墨子请鲁班抽中心板”的古银杏树；⑧修尧山风景区发现的“墨子洞”，该洞有可能为墨子晚年创立隐灵教的第一教庭；⑨熊背乡“黑隐寺”，为墨子老年隐居地和卒葬地；⑩熊背乡“土掉沟”，相传墨翟为隐居故乡而去“土”为“黑”姓，鲁山黑姓亦视墨子为其始祖。此外，鲁山还有相当多有关墨子的遗迹与传说。

4.鲁山一直活动着墨家传人。他们长期宣传墨家思想，劝善禁恶，救世济人。这些人又多从事木工建筑等技艺。并有一定的民间组织，如灋河乡黑石头村尹辰太，马楼乡关店村姜套等，他们尊“黑祖”，传“善人”，对外称“善钜”，与墨家“钜子”的称谓相一致。这也与墨子弟子多楚人，墨家后传多南方人的情况不无关系。

5.今人的考证。如本文第四部分所述，豫、鲁有关墨子里籍之争引起史学界极大反响，越来越多研究墨子的专家学者援笔介入来支持“鲁阳说”，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对“滕州说”进行反驳，以大量的历史依据和严密论证，证明墨子里籍只能在鲁阳。即便滕州利用其经济优势创造了“宣传效应”，但永远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有力论据。

### 七、关于近年河南墨学著述情况

墨子里籍之争，也带来了墨子研究的繁荣。具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自杨晓宇、潘民中主编的我国研究墨子里籍问题的专著《墨子里籍考辨》出版后，又出版的《叶公沈诸梁与楚“方城之外”》，也涉猎墨子里籍在鲁阳的问题。台湾鲁山籍冯成荣先生的《墨子》研究系列丛书，多方面对墨子里籍进行论证；复旦大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希燕《墨子研究》，是对墨子鲁阳说的全面阐述；萧鲁阳、李玉凯主编的《中原墨学研究》，总结了当时的墨子与墨学研究成果；萧鲁阳《鲁阳墨论》《墨子元典校理与方言研究》、行侠仗义说墨子》等著述，对墨子学说和里籍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释；郭成智的《墨子鲁阳人考论》，陈金展的《墨子在鲁山的史料与传说》，张斌峰的《近代墨辩的复兴之路》；高秀昌的《墨子》校注，张新河、张九顺《墨子鲁阳悬疑案——墨子里籍与事迹考实》，潘民中、杨晓宇《平顶山历史名人传》《平顶山名胜古迹》，平顶山文史资料《平顶山历史人物》，宛芳卿、杨晓宇的《平顶山十大历史名人》，鲁山县筹拍的数字电影《墨子》，杨晓宇、郭成智为嘉宾的《鹰城墨子》专题文化宣传片，平顶山市图书馆的数字图书库《墨子》等相继出版问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

也使墨子思想文化得到了更大的弘扬。

## 八、社会组织建立和学术研究简况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平顶山市委委托、社科联主办的理论刊物《求索》，在时任社科联秘书长、副主席和常务副主编杨晓宇的努力下，率先开辟了“墨子研究”专栏。并与平顶山师专（现平顶山学院）教授谢照明、平顶山史学专家潘民中等一起，着手与河南省社科院及有关大专院校专家联系，筹备全国墨子里籍研讨会和平顶山市墨学学会。后为扩大影响，市墨子学会的筹备工作改由河南省社科院赵保佑副院长和图书馆馆长萧鲁阳研究员等筹建河南省墨子学会。在此期间，萧鲁阳先生作了大量的研究、交流、协调工作。潘民中、杨晓宇也相继会晤新华社资深记者万福元，促其把墨子里籍在鲁阳写成新华社通稿；与全国文化名人、北大教授钱文忠交流墨子里籍问题，纠正其在央视百家讲坛有关墨子里籍的不正确论点；数次与复旦大学博士徐希燕探讨墨子里籍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接待原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主任李广星一行来平顶山鲁山对墨子里籍的考察等，都促进了筹备工作及后来墨子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

1997年10月，全国墨子里籍研讨会暨河南省墨子学会成立大会召开，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葛纪谦任第一届会长；经过两次省、市学术讨论之后，2003年，河南省社科院成立墨子研究中心；2004年8月，墨学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2008年初冬，墨子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2009年年底和2011年秋，在鲁山召开了两次墨子故里高层文化论坛；2010年10月，在平顶山市召开了鲁班与鲁班文化研讨会；2011年7月，平顶山学院墨子学院挂牌；2012年春，以“墨学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主题的第四届国际墨子学术研讨会召开；201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成专家组对鲁山的墨子故里文化遗存数次考察，2013年1月授予鲁山县为“中国墨子文化之乡”，并同时批准建立“中国墨子文化研究中心”。墨子文化与墨学，这一中华民族思想宝库里的璀璨明珠，必然会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中，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